



桂东南学人文丛

丛书主编 王志明 王卓华
副主编 徐一周

文学观念的 裂变与重构

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学转型研究

Wenxue Guannian de Liebian yu Chonggou

荣 / 著

CHINA YOUNG UNIVERSITY PRESS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出版社



“玉林师范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

丛

文学观念的 裂变与重构

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学转型研究
Wenxue Guannian de Liebian yu Chonggou

杨 荣 / 著

丛书主编 王志明 王卓华

副 主 编 徐一周

成 员 黄健云 梁忠东 黄桂凤 徐爱春

毛家武 肖 霞 陈桂成 冯广坚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观念的裂变与重构: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学转型研究 / 杨荣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12

(桂东南学人文丛 / 王志明, 王卓华主编)

ISBN 978-7-5495-4932-0

I. ①文… II. ①杨…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0474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西清路 9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开本: 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11.25 字数: 320 千字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哲学·文学·文化

总主编 王志明

“哲学文学关系之密，古今中外皆同。西人多有哲学为文学之灵魂，文学以哲学为内涵之论。”这是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唐君毅先生之于哲学与文学关系的界说。哲学追求的是真理、抽象、理性、普遍与客观；文学本质是虚构、形象、情感与特殊。哲学作为一切学科的母学科，与所有学科都有密切的关系，文学也不例外。文学可以更好地表达哲学，哲学可以更好地服务文学，文学形而上的思考就是指文学的哲学意蕴。

文学是“人学”，阅读文学作品是为了解决“人生”这样一个大问题，是为了追寻“诗意栖居”的人生境界，生命走向明晰、自由、敏感的境地是阅读中的期盼。然而，人生丰富复杂，很多时候并非逻辑论断可以概括。生命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的每一个细部的丰富而复杂，“人生”具有不可概括的无穷的可能性，此时就可以借助于哲学来进行阐释。

文学的阐释是多维度的。以“哲学”伦理来研究文学已然成为一



种趋势,在中外文学评论界里“常态”存在。对文学特别是小说而言,仅仅就艺术和文学作品本身的“就事论事”阐释解读往往是不够的,艺术作品必须去观念化,增加艺术的美感感悟性(即体悟文学的“哲学”意蕴研究),才能彰显文学的魅力。传统的艺术审美对文学文本进行解读往往致力于创作心理机制的追寻和阐释,以及理论接受者的主观因素,这往往就会缺少哲学思考。众所周知,作家在创作时是经由艺术的发现和艺术的追求来加工创作的,他们没有以既定的逻辑哲学来叙述故事(这也成为部分哲学文学无关论者的口实),但是故事本身就“潜隐”着哲理,哲理的存在是文学深层的内核。阅读者若能以“哲学的眼光”来解读文学文本,其深层的内核意蕴就得以呈现。从文学活动来说,哲学解读是一种再创造的文学创作方式,它参与了建设文学文本的内蕴生成性和建构性,也就是说文学的哲学意蕴是通过细读文本中哲学思考的探询和学理的分析,才能感悟出它的意识形态内蕴,才能追寻到终极的文学性。文学和哲学是不可分的。没有高度的哲学理性渗透其中的文学,将是凌乱的生活材料的组合和拼接,这种文学最多只能算是没有灵魂的故事;没有鲜活的生活体验为基础的逻辑推理的文学作品,给读者留下什么印象是难以想象的。

文学研究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从词源学考究,“文化”在拉丁文中为 *cultura*,英语中是 *culture*,原意为“耕种、栽培、居住”,体现了人类改造自然的意义。经过对“人”的哲学阐释,文化于是就有了更深层次的现代意义,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这是多数人的共识。作为一种生活姿态,文化具象以模式化的形式存在于人们日常的社会生活之中。我们常常会接触到“某某文化”,如“饮食文化”、“民俗文化”、“传媒文化”,等等。当我们探究追寻其意蕴的时候,文化成为一种视角、一种方法,也就成了一种学术姿态。追溯文化根源,认识文化本质,是我们对自然的认识,在这种认识中逐渐形成一种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融汇到社会意识的洪流中,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将会起到助推作用。对于“文化”的讨论绵延不绝,试问“现在,还有什么不是文化?”



桂东南,从地域文化版图上审察,是一个远离文化中心之域。远古时代曾称为“南蛮之地”,很有边缘文化或亚文化的意味,历史上对桂东南社会文化的地位评价并不高,这与这片土地的地理环境、经济发展、历史积淀等诸多因素有关,与我们的信心不足也不无关系。其实,桂东南的文化并非人们“刻板印象”中那般不堪,我们大可不必妄自菲薄,桂东南文化也有其独特的张力。桂东南毗邻广东和海南,受岭南文化和海洋文化的双重影响,坚忍不拔的“山岭精神”和勇于拼搏的“海洋精神”融合在“神鬼永不灭”的“鬼门关”和“巫文化”里,这铸就了我们更为坚韧、爱拼和广博的文化精神品格。追昔抚今,这里的人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涌现出一代代墨客文人、先贤才俊,为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现代的桂东南学人特别是以玉林师范学院诸多学者为代表的桂东南学人,在众声喧哗、浮躁难安的当下,利用桂东南唯一本科院校快速发展的机遇,承前启后,静坐南窗,进行着集体的学术思考和审察,续写着桂东南学人一如既往的辛勤探索历史,他们从桂东南基地出发,走向广西,延伸到全国,也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从冯广圣的《桂村社会传播网络研究》、王易萍的《西部农村地区水利困境的文化人类学解读》、王卓华的《康熙博学鸿儒辑考》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研究轨迹。

桂东南的文学园地也同样五彩斑斓,同在桂东南文化精神的感召和激励下,学人们借助哲学的阐释工具,从古代文学到现代文学,从广西文学到中国文学,对文学进行了深入探究,王志明、郑立峰的《广西文学的哲学解读》就作了积极的努力。他们以哲学的元理论来观照广西文学,认为广西文学的创作主体在哲学理念上,自觉穿越边缘文化的局限,主动熟习中国中心与世界中心的先进的哲学文化意识和文学审美思想与叙事方式,培养自己在精神领域内跨越族裔或区域界限,作旅行式的思考与跨界思维。他们主张文学与文化要坚持“差异表述”的哲学内涵,坚持差异产生于边缘对中心的对话、挑战甚至对抗之中的理念。在文学创作上,坚守边缘人的自我的生命体验、审美情怀与文化哲学观念。这使他们克服了单一的边缘文化所



带来的局限,获得一种新的混合的文化立场,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人生哲学、审美情趣、艺术思维,乃至题材选择、叙事方式等,进而给广西文学带来全新的审美特质,提升了广西文学意蕴的深度。这种全新的审美特质既表现为对主流文学审美价值的抗议和叛逆所带来的异质与异趣上,又表现为对主流文学审美价值的承接与沟通所带来的先锋性上。胡强的《中国古典小说的文化阐释》把我们的视线延伸到古代,杨荣的《文学观念的裂变与重构——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学转型研究》又将我们带回当下,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运用哲学的深层理论,对文学进行不同层面的探究,值得肯定!

《桂东南学人文丛》是继2010年出版的《桂东南社会文化研究成果丛书》之后的又一套展示桂东南学人成果的力作,前一套书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我们有理由对本套丛书有更高的期待。我为桂东南学人取得的研究成果由衷地感到高兴的同时,也期望未来更多的学人奉献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将桂东南的文化精神发扬光大!

是为序。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文学生产的新语境 >>>>4

- 第一节 转型时期的文人心态……………5
- 第二节 市场化语境下的审美变迁……………21
- 第三节 90 年代初期的文学生产……………45

第二章 文学空间的分裂 >>>>67

- 第一节 日常的风景：“新写实”与 90 年代以来的文学
……………68
- 第二节 心灵的虚无：《废都》及其影响……………85
- 第三节 重返现实：《活着》与先锋文学的转型……………98

第三章 文学趣味的转移 >>>>115

- 第一节 想象过去的方式：90 年代初怀旧文学的发生及影响
……………117



第二节 怀疑与“重构”:90年代初历史小说创作的转型

.....136

第三节 散文热与文化大散文的省思.....154

第四章 文学道德的两难处境 >>>>>173

第一节 倾斜的批评:对“王朔现象”与“《废都》风波”的考察

.....176

第二节 未竟的思考:“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回顾及反思

.....194

第三节 90年代初期的文学批评转向.....210

第五章 90年代中期后的文学 >>>>>230

第一节 裂变与分化:90年代中期后的文学趋势.....232

第二节 唯“物”主义:消费时代的文学景观.....253

第三节 批评的现状与理想:对商业化语境中文学批评的思考

.....266

结 语 >>>>>283

主要参考文献 >>>>>287

附录:博士期间写作或发表的相关论文 >>>>>293

后 记 >>>>>351

引言

作为一个自然的时间段,20世纪90年代初期(论文主要涉及1989至1994年间的各种文学现象,但由于行文的需要,在论述中也兼及之前或之后的一些文本与事件)和历史上的诸多时段一样平淡无奇,但如果将它放置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中予以考察,一种异乎寻常的重要性便鲜明地凸显出来。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20世纪90年代初期那些有影响力的文学事件:

1989年,《钟山》推出“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以池莉、方方、刘震云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被囊括其中,由此,文学对日常生活的书写获得了一种合法地位,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后来的小说创作。

1992年,贾平凹提出“大散文”概念;同年,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并随之引发了中国散文界的文体革命。

1992年末,《收获》杂志同时刊出了余华的《活着》、孙甘露的《忆秦娥》、格非的《边缘》、述平的《凸凹》,这些带有明显写实风格的小说正式宣告了盛极一时的先锋文学已经走向了尾声。

1992年,王朔等人的“海马影视创作室”正式注册,旗下包括苏童、刘恒、池莉、刘震云等知名作家;同年,作家张贤亮出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属下的“艺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戏剧家魏明伦



组建“魏明伦文化经纪公司”，自任总经理。文人大规模“下海”的序幕就此拉开，其运作模式对中国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

1993年5月，“陕军东征”。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工人出版社先后推出了一批陕西作家的长篇小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废都》和《白鹿原》。《白鹿原》重印7次，发行50多万册（不含盗版）。《废都》起印数为17万册，加上历年盗版，估计印数达千万册以上。同年，文化界展开了对王朔小说和《废都》现象的大规模批评。

1993年9月11日，“’93深圳（中国）首次优秀文稿公开竞价活动”开幕，800多名作者逾7000万字的文稿参加竞价。作家霍达的电影剧本《秦皇父子》以100万元成交价，创下20世纪中国文稿卖价之最。

1994年，“新状态小说”、“新体验小说”及其他“新”字号小说的命名正如火如荼，中国文坛追新逐异的态势愈演愈烈。

1993年至1996年，知识界掀起了旷日持久的“人文精神大讨论”。

.....

9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坛，出现了诸多引人注目的文学事件，它们的集中爆发成为一个时代转型的鲜明标志。从创作主体的心态、文学作品的生产与传播到读者的阅读趣味都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调整和转变。市场化的有力介入，使中国文学传统的“载道”功能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放逐与嗤笑。如果说，“五四”对“人”的发现开启了中国历史的现代化进程，并在刚刚过去的80年代重新赓续和复现了这一辉煌，那么，90年代的文学则把对“物”的崇拜推拥到一个不甚恰当的地步，唯“物”主义的灼热气息，充塞着文学内外和生活现场的每一个角落。“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不管在这种划时代的巨变中，我们经受了怎样的冲击、失落和迷惘，一种崭新特质的“文学场”业已形成，文学从此开始了它另一轮新的征程。在笔者看来，90年代初期应该是文学史上值得书写的一个重要的时间段，因为它具有“开端或结束”的非凡意义。一系列的文学事件所造成的影响、结果乃至事



件本身,成为了之后若干事件的缘起,甚至奠定了后来文学的基本风貌。因此,只有对90年代初期的文学现场进行仔细的梳理,我们才能合理、有效地解释90年代末期以及新世纪以来的诸多文学现象,进而可能发现它们与90年代初期文学在精神意义上的某种隐秘的联系。

第一章 文学生产的新语境

有论者认为,20 世纪是一个“非文学的世纪”^①。这个观点或许有待商榷,但它确实指出了 20 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之间的亲密关系。自 20 世纪初梁启超欲借小说之“魔力”培养国民政治觉悟起,文学与现代中国的政治历史进程就紧紧捆绑在一起。其间,除了“五四”时期短暂的“人的发现”之外,文学基本上陷落在巨型的政治话语中无力自拔。从“左翼文学”、“抗战文学”到“文革文学”以及 80 年代初期的文学,中国文学的每一次迈进都深深地镌刻着政治的烙印。按照布尔迪厄“场域”理论来进行描述的话,那就是“政治场”对“文学场”的控制和挤压,并最终导致了“文学自主原则”的丧失。然而,时代总在不断前进,这种“政治—文学”一体化的极端局面终归会被打破。80 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和商品经济的勃兴,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逐步取代政治成为人民日益关注的焦点,域外涌入的通俗文化以凶猛的姿态席卷着昔日萧索、单一的文坛,大众传媒也凭借其独特的传播优势对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产生着根本性影响。这一切迅猛的变化在经历了 1989 年短

^① 朱晓进等:《非文学的世纪》,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



暂的停滞之后,更以加速度的方式推进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及至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式确立,一种崭新的文化语境开始以清晰的面貌逐步呈露于世人面前。“经济场”替代“政治场”对文学产生强力影响;文化空间持续分裂,精英文化、通俗文化与主流文化齐头并进;消费主义大潮来势汹汹,文学逐步商品化。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会转型中,作家的创作心态、文学的审美观念、文学的生产机制都在相应地进行着调整与转变。正是在这些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90年代的文学转型才最终得以发生。因此,本章主要考察转型时期的文人心态、文学观念和文学生产机制三个方面,以便深入而详尽地阐述90年代文学转型得以发生的复杂原因。

第一节 转型时期的文人心态

从哲学的意义上说,“社会转型是指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特殊的状态和特殊的过程,是在社会生产力不断出现新的质向要求中,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和根本性的相应变革”^①。这就意味着社会转型的核心是社会结构的变化,“是社会整体系统从一种结构状态向另一种结构状态的过渡,它表现为社会系统全面的,结构性的调整与转化”^②。一般而言,这种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其影响是极其巨大的,它必然会导致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的整体性转换,也必将对社会生存实体(个体与群体)的生活方式、心理结构、行为规范、价值取向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已经经历了两次结构性的根本变革,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中心范式,转型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发展范式;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传统结构范式,转变为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现代结构范式。短时间内

① 刘玲玲:《对社会转型范畴的哲学思考》,北方论丛,1996(5)。

② 闫志刚:《社会转型与转型中的社会问题》,广东社会科学,1996(4)。



的两次结构调整,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全方位变革,它对于中国文化的整体结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及情感,冲击力量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一切自然也会作用于文学。转型时期的文人心态影响和决定着文学作品的基本面貌,通过对他们复杂心态的勘察,或许可以更接近 90 年代文学转型的真相。

如果将目光重新回溯到 90 年代初期,我们将会发现,文艺界曾弥漫着一股相当浓厚的失落感和焦灼感:“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①,“读者冷淡,文坛焦灼”,“文化面临危机”^②,“当代文学的种种‘迷失’”^③,“市场经济了,文艺怎么办?”^④大多数作家的哀叹与迷茫以及批评家们的焦虑与呼唤成为了那个时期最基本的文学表情。的确,在当代文学体制确立以来的四十年间,知识分子已经完全习惯了所谓的“中心”位置。无论是被批判还是被追捧,他们总处在那个非常态的“中心”。至于“边缘”的感受和体验,对他们而言,则是十分遥远与陌生的。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坛三公案”到“土改”、“反右”以至“文革”,知识分子始终处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而不断地接收批判和改造则几乎成为他们最重要的人生任务。新时期到来,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知识分子由昔日的批判“靶子”摇身一变成为国人热烈追捧的“目标”。“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文学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产生的社会轰动效应经久不息。在这段政治与文学短暂“合谋”的蜜月期中,知识分子感受到了未曾有过的荣耀与满足。这种巨大的成功,不仅使他们暂时忘却了尚未复原的“伤痕”,而且也再一次激发了他们对“中心”幻象的向往。但好景不长,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以及市场经济的全面启动,热浪滚滚的“文学场”被迫迅速降温。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文学的位置被实实在在地挤

① 阳雨: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以后,文艺报,1988(4)。

② 陈继会:精神疲惫、文化阵痛和文学进路——文学现状与发展乱弹,文学评论,1988(6)。

③ 陈世旭:当代文学在哪里迷失,文学评论,1988(6)。

④ 王双龙:市场经济了,文艺怎么办,文艺争鸣,1993(1)。



到了社会的边缘。几年前还洛阳纸贵的文学盛况,如今已恍如隔世。文学不再是人们谈论的焦点,甚至连批判的焦点也不是,它如此迅速地淡出了社会的“中心”,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无关痛痒的存在。这种猝不及防的双重抛离(政治与经济),对于长期以来坐惯了“中心”交椅的敏感的人文知识分子而言,其所引发的心灵震荡是短时间内绝难承受的。于是乎,一时间出现了“文学失落”、“文学崩溃”、“文学边缘化”的种种惊呼。

逐离“中心”诚然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但当这种痛苦已变成不可逆转的事实时,如何应对与调适就成为了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此,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呈现出种种不同的心态。首先就学术评论界而言,笔者以为90年代初期的批评界普遍显得焦虑、狂热有余,而理性、沉稳不足。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大致不会忘记,从1989年《钟山》杂志举办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开始,一系列的所谓“新”小说密集爆发。“新状态”、“新历史”、“新体验”、“新都市”、“新乡土”、“新女性”……种种以“新”命名的小说几乎成为90年代文学界的一大奇观。如果舍弃命名的各种商业化因素不论(“新写实”小说就带有典型的商业运作行为),那么这些高度雷同,缺乏内涵与思想张力的命名到底折射了批评主体一种怎样的心态呢?让笔者从两个实例说起。

1994年,《钟山》杂志和《文艺争鸣》联袂提出了“新状态文学”的概念,并声称“这是一次南北联合,是创作刊物和评论刊物的一次愉快合作”^①。他们认为,“中国文化的深刻转型已日益显露出不同以往的‘新状态’”,“一大批长篇新作的问世和规模广泛的新散文创作热潮,表明文学对90年代新的生活状态和文化状态的极大敏感”^②。并随之列举了王蒙《恋爱的季节》、刘心武《风过耳》和《四牌楼》、张承志《心灵史》、王安忆《纪实与虚构》等长篇,朱苏进《接近于无限透明》、张贤亮《烦恼就是智慧》等中篇,以及何顿《生活无罪》、陈染《与

① 参见:文学:迎接“新状态”——新状态文学缘起,文艺争鸣,1994(4)。

② 阿极:《文艺争鸣》、《钟山》提出“新状态”文学,社会科学战线,1994(5)。



往事干杯》和马建、韩东、海男、鲁羊等人的作品，指出以上一大批青年作家的作品已经呈现出与“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不同的新质素。它们“不像‘新写实’那样完全从外在的视角去描述一个客体，也不像实验文学那样沉迷于语言形式的探索，它对生活的鲜活状态保持一种敏锐的感觉，在艺术形式探索上保持一种不经意的自由状态，一切都以最充分地呈现当下的生存状态为旨归。它是对‘新写实’和‘实验文学’的双重超越”^①。应该说，这些观点并非完全空穴来风，而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存在价值。但问题在于，当我们仔细对这一命名进行学理上的探究时，许多逻辑上的矛盾甚至事实误判就出现了。“新状态文学”从文坛的新状态、作家的新状态、文学的新状态来进行概念的限定，这样一来，几乎囊括了 90 年代所有的作家及现象，所指过于宽泛，命名的意义随即丧失。事实上，王蒙的《恋爱的季节》、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刘心武的《风过耳》、朱苏进的《接近于无限透明》在写作手法上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这些作家与陈染、何顿、海男、韩东等“晚生代”的创作也各异其趣，把这些异大于同的作家笼统地归为一派，实为牵强。此外，倡导者本身对于何谓“新状态”也说法不一。王干说：“首先我觉得这种新状态不是一种创作手法，也不是一种主义，它是社会文化的转型给创作带来的一种转折机制。”^②张颐武认为：“市场文化的冲击对高雅文化或纯文学的调整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在这种情势下，文坛上出现一种适应 90 年代文化转型的新状态，文学创作出现新的趋势，即新状态文学，是顺理成章的。”^③张未民表示：“面向 21 世纪，世界文化正在走向一个多媒体时代，在中西交错的现实之下，文学必然要有自己的思考和选择。这几年在电视体系和文化工业的挤压下，文学的发展就很说明问题，你不得不进入新状态。”^④种种莫衷一是的说法，不仅让人无所适从，也明

① 王干，张颐武，张未民：“新状态文学”三人谈，文艺争鸣，1994(3)。

② 王干，张颐武，张未民：“新状态文学”三人谈，文艺争鸣，1994(3)。

③ 王干，张颐武，张未民：“新状态文学”三人谈，文艺争鸣，1994(3)。

④ 王干，张颐武，张未民：“新状态文学”三人谈，文艺争鸣，1994(3)。